

■ 学者导读

幽原读陶记

——《幽地陶韵：泾河中游新出商周陶器辑萃》序言

张天恩

近20年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师生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同行在泾河中游地区，古邠地持续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发掘工作，对淳化枣树沟脑，旬邑西头、孙家、枣林河滩等遗址进行了规模不等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编写的资料研究图录：《幽地陶韵：泾河中游新出商周陶器辑萃》（后文略称《幽地陶韵》），汇集了多年发掘出土的商周时期典型陶器，方便学界尽早了解更多考古发掘的重要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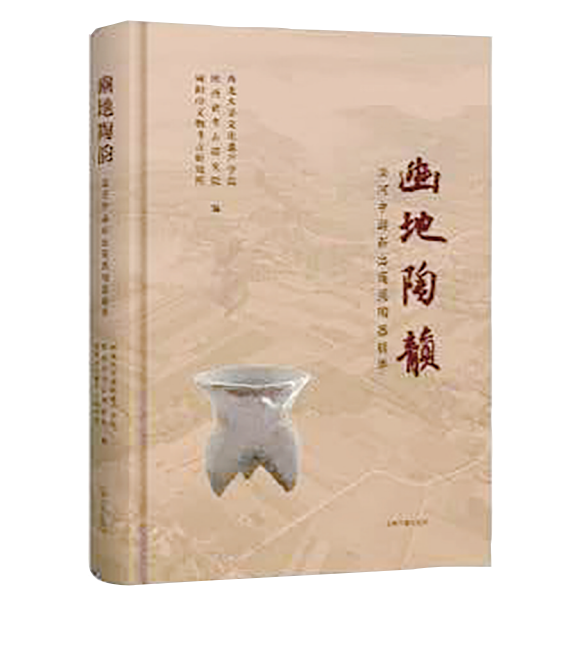
据历史记载，周民族发祥于古邠地。经梳理文献，其具体指向彬州、旬邑相邻区域以及淳化、长武等县。有关周人历史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已有80余年。到20世纪90年代，该区域西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已比较普遍，但晚商（先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相对较少且相当复杂。

年代约相当于殷墟文化一、二期的早期遗存主要有两大类：其一是以长武碾子坡遗址为代表的碾子坡文化（也被称为先周文化）早期遗存，分布在长武、灵台及麟游县西北部；其二为以旬邑孙家、彬州断泾遗址下层为代表的“孙家型”先周文化遗存，较集中地分布于彬州、旬邑境内。

而相当于殷墟文化三、四期的晚期文化遗存，主要也有两类：其一是见于彬州断泾遗址上层、淳化黑豆嘴等遗址，具有明显的以陕晋高原地区李家崖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特征的遗存；另一为碾子坡文化晚期遗存，主要见于碾子坡和漆水河上游的麟游蔡家河等遗址。

因断泾遗址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可知孙家型遗存早于黑豆嘴类北方文化遗存。碾子坡文化早、晚期遗存虽有较多相似性，但以陶器为代表的物质遗存的衔接尚欠紧密，故学界普遍认为两期遗存之间还有一段缺失。早年考古发掘中的这些不足，近20年的发掘工作给予了不少的填充。反映这些信息的《幽地陶韵》图录，就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先睹为快的绝佳机会。

旬邑孙家遗址、西头遗址鱼嘴坡地点，淳化枣树沟脑遗址的发掘，扩大和补充了孙家型遗存的分布区域和密度。相关遗址早期单位出土的花边口沿甗、鬲，折肩罐（瓮）、平沿豆、深腹盆等陶器，与孙家型遗存的面貌高度一致，极大地增加了该类遗存的新资料，丰富了其内涵，相关遗址的层位关系佐证了其文



化遗存可分为两期的推论。结合这些新的发现，将为孙家型先周文化研究增加强劲的动力，会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

旬邑西头遗址鱼嘴坡 H262、H62，枣林河滩 H71、G12等单位出土的高领袋足甗，普遍体偏高，多为扁锥略长状足尖，口沿外附加的薄泥条带饰绳纹，裆底饰横绳纹等特征，均与宝鸡纸坊头遗址 4B层、周原刘家 M27等单位出土同类陶鬲的特征一致，年代约为殷墟三期，亦呈现了碾子坡文化早晚期袋足鬲过渡形态的迹象，是一个需要认真关注的问题。属于碾子坡文化这一阶段的遗存，曾在麟游县蔡家河等遗址有所发现。研究认为，其文化在早期之后主要向西南方向发展。但新的资料可以表明，碾子坡文化向东南也有强势扩展的现象。约在殷墟三期该文化处于一个较大发展的阶段，在东南方向已抵达旬邑西部地区，几乎占据了孙家型活动的中心地区，似为后者迅速衰落的重要原因。

随后，我们在这两个遗址中可看到更多的碾子坡晚期遗存，特别是两地的墓葬充分显示了碾子坡晚期文化的特点。随葬的袋足鬲均较低矮，足尖普遍为极

低的圆锥状，裆底多见戳刺纹。墓主骨架女仰身、男俯身的独特墓葬习俗，也出现在这些墓地。即使孙家型命名的旬邑孙家遗址的晚期，也突变为以碾子坡晚期遗存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尤其是 H78、H194等单位出土陶鬲颇为典型。

有关发现显示，孙家型遗存虽在当地仍有延续的线索，但在多个遗址中迅速衰减或几乎消亡的迹象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这当然不能排除与碾子坡中期文化南下三水河一带有关，但同时也需关注彬州断泾上层、淳化枣树沟脑遗址晚期以 F14所出三足瓮、花边甗等为代表的李家崖文化遗存，在相关遗址内基本取代孙家型文化遗存的事实，以及西头上庙地点 M5、M40等陶鬲颈部饰一周较细堆纹的北方文化特征。这表明北方文化向西南至于泾河中游的淳化、彬州和旬邑相邻地区，几乎同时成为孙家型文化的另一种威胁。

除了以上两大势力之外，在更晚的商周之际又出现了两类文化遗存。西头遗址南头地点 H154的较早遗物中，可见刘家文化晚期的典型高领袋足鬲（H154：5），以及泾水上游尚未多见的高弧领花边袋足鬲（H154：3）。前者和上庙地点 M20所出高斜领联裆鬲、枣林河滩 H91的重菱纹陶盆等，共同代表了郑家坡型先周晚期文化在古邠地的活动。而高弧领袋足鬲的出现，却与陇山两侧晚商时期姚河塬遗址当地文化因素有关，其历史文化背景亦值得玩味。

《幽地陶韵》很好地展现了晚商时期多种性质、来源不同文化在古邠地的先后交集、主体变迁、融合共存的多彩画卷，反映了当年这一区域人群活动的复杂多样性，为研究了解周民族居邠时期的生存环境、太王迁岐前后的文化历史状况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值得去认真探索。

另外，该书还著录了不少西周早中期的典型陶器，与周原、丰镐等西周都邑遗址出土器物虽多有相似，但也有一定的差异。如鬲、簋等器形更多，同样值得深思。

（本文为该书序言，有删减）

《幽地陶韵——泾河中游新出商周陶器辑萃》
编著：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1月

■ 编辑手记

传承与创新

——从《盘龙城（1995~2019）》看大型考古报告的出版

雷英

中国考古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而这些成果如何及时、规范发布与共享，成为考古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国家文物局强调要“实施考古报告出版工程”，“压实100项积压报告、100项重点报告的编写责任”，推动考古报告出版。在这方面，《盘龙城（1995~2019）》的出版无疑走在前列。

盘龙城遗址发现于1954年，1974年开始发掘，2001年出版了第一本报告《盘龙城（1963~1994）》（以下简称“老报告”），对1974年至1994年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之后一直有一些零星发现，直到2016年武汉大学开始接手，盘龙城又进入持续的发掘。2024年11月出版的《盘龙城（1995~2019）》（共5卷6册），既总结了前人的工作，又对新的发现进行了梳理，并从景观与环境、玉石器、陶器、青铜器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它不仅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的里程碑，更以其卓越的编纂理念与实践，为新时代考古报告树立了全新标杆。

通过“《盘龙城（1995~2019）》创作分享会”和总主编张昌平老师的讲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套书的主创团队在学术传承、工作创新、出版匠心三个方面的努力与用心。

学术传承

《盘龙城（1995~2019）》体现了深刻的学术史情怀与序列意识，主要体现在：

在内容上，报告首先对各地点遗存的历年考古工作和成果分别进行了梳理，包括城址、李家嘴、杨家湾、杨家嘴、小嘴、王家嘴等，让读者对报告背景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同时继续沿用老报告已搭建的分期框架，使之形成有机整体。在形式上，整体的体例和编排方式都延续老报告；封面设计延续老报告的色调和风格，封面题字“盘龙城”沿用俞伟超先生原来的题字；书的定名也是考虑形成可持续的“盘龙城报告序列”，即以“盘龙城”为题，加上发掘年份。

以上这些，绝非简单的形式模仿，而是明确表达了对考古前辈的致敬，并意图构建一个接续序列，将传承的理念贯穿于学术生命之中，希望一代代盘龙城考古人将考古事业发扬光大。

工作创新

多学科深度融合 盘龙城的考古工作中融入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田野考古所获遗存样品的科技检测，需要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提前设计。为此，盘龙城项目组搭建了跨机构、跨领域的协作平台，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国内外顶尖机构合作，在动植物考古、玉石器研究等领域深化探索，让多学科融合从“辅助补充”变为“核心支撑”。这一点也体现在报告中，为方便读者，科技考古的成果不再像以往那样以附录形式呈现，而



是将碳-14测年、动植物遗存分析、土壤微痕、青铜器铸造工艺科技检测等，融入遗迹遗物的描述与分析中，融入报告与研究专著里，比如在报告中提到年代时，可以看到碳-14的测试结果；在描述出土植物遗存时，可以看到植物的切片分析图片等，让科技数据与考古学解释浑然一体，共同构建历史图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深度融合。

年度整理机制 长期发掘项目的报告一般体量巨大，报告的整理者常常因为千头万绪，陷入“数据的海洋”而出不来，以致最终出版也是一拖再拖。考虑到这种情况，在发掘之初，张昌平老师就制订好计划，统一编写体例和规范，要求每一个发掘年度负责人都要拿出年度报告，一个简本（可用于发表简报），一个繁本（可用于出版报告），这样到最终出版前，只需要把历年的报告整合到一起，工作量就小多了。

“报告+研究”体例 本书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其“报告+研究”的立体化编纂体例。在出版田野考古报告的同时，向景观环境及器物研究进行延伸，同时推出研究专著，这超越了传统报告单纯公布材料的范畴，构筑了一个有机结合的体系：上册《田野考古工作报告》两册，是对1995年至2019年间杨家湾、小嘴等地发掘成果的全面、系统公布；下册则同步推出《景观与环境》《玉石器研究》《陶器研究》《青铜器研究》四部专题研究专著，这意味着，团队在完成资料整理的同时，已基于这批材料进行了前沿、深入的学术攻关，将“公布”与“研究”融为一体，开启了“资料库”与“学术引擎”合二为一的新范式。

每卷单设书号 这套报告分5卷，每卷都有主要创作者，为了全面体现书的价值，出版社打破常规，除了为整套书申请总书号，还为每卷单独申请了书号，这样一来，5卷合起来是一套报告，其中研究卷为报告服务，而单独来看，研究卷各自也可以作为专门领域的专著供大家学习，既体现了总体，又体现了各卷的特点。

出版匠心

图文混排，信息聚合 报告彻底摒弃了传统报告中图版、附录分离的模式，采用图文混排的模式，尽量做到“按单位公布、图文同页”，让读者在阅读一处遗迹时，可在同一视野内看到其线图、现场照片、出土遗物线图与多角度照片、陶系统计表，以及相关的科技检测结果（如木炭显微照片）。这种设计，实现了遗迹、遗物、科技数据信息的瞬时关联与无缝对接，极大提升了研究效率。这不仅是版式创新，更体现了“以研究需求为导向”的编纂理念，提升了阅读体验。

设计考究，精益求精 在内容上，配什么照片，什么角度的照片，定什么图名，创作团队都是反复斟酌的，尽量做到信息最大化。例如，一件青铜器会同时呈现整体、细部、正侧、铸痕、X射线等多角度照片；遗迹介绍不仅有线图，还配有专业发掘场景的照片。如介绍“小嘴 G1-JPG2”时，页面集中了平剖面图、现场照片、木炭显微影像、出土陶范与陶器线图、陶系统计表等，构成了关于该遗迹单元的“信息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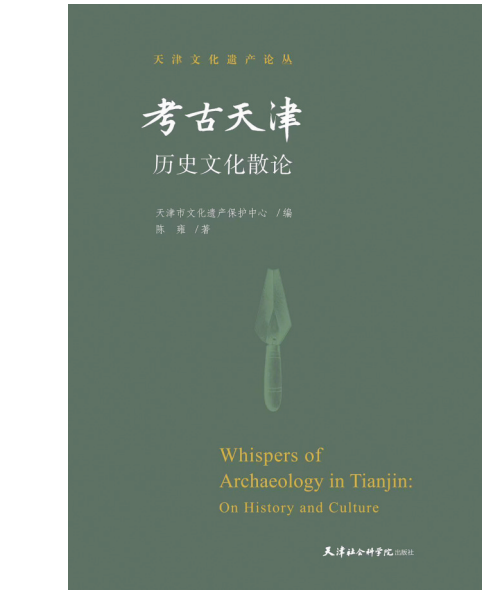
在版式效果上，会根据情况调整图片数量及内容。具体到哪张图和哪张图放在一起，怎么放好看；线图和照片在一起的摆放顺序和位置关系，大小安排，图片的拆分等；甚至精细到哪些图需要加什么颜色的底色，而另一些又不同。有时为了有更好的视觉效果，还会临时安排补绘图片和补拍照片，直到出来的色彩、纹理比较接近真实器物。这种对出版细节的执着，也体现了将考古报告作为“传世之作”来打造的学术责任感。

专业的编校团队 为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5卷6册的出版，出版社组织了专业的编辑团队，各自负责1~2卷，再由牵头编辑负责统筹推进。在制作上，因为涉及的线图、照片、表格特别多，时间紧，要求高，也是安排图片处理、文字处理、封面设计人员分工协作，同步进行，最终保证了图书的按时高质量出版。

《盘龙城（1995~2019）》的成功编纂，生动诠释了新时代考古报告所承载的多元使命：它既是严谨扎实的资料档案，又是前沿问题的研究平台；既是对学术传统的深情致敬，也是面向未来的范式创新。它表明，一流的考古报告已不再是田野工作的被动总结，而是能动设计的综合性学术工程。这套报告所体现的“全面性、融合性、可读性、精致性”，正是对中国考古报告百年演进脉络的最新回应与升华。它标志着考古报告的编纂，正从单纯的“记录过去”，转向更积极地“构建通往过去的知识体系”，并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肩负起文化传承与文明阐释的当代责任。

（作者单位：科学出版社）

《盘龙城（1995~2019）》
编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作为“天津文化遗产论丛”系列的开篇之作，陈雍先生的新著《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以下简称《考古天津》）今年3月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以考古学方法论为指导、以天津地域为样本，旨在“透物见人”，系统阐释地方历史文化的论文集。书中收录创作时间跨度达三十多年的59篇文章，涵盖考古研究、科学普及、遗产保护三大类别，是一位考古工作者对天津这座城市历史、空间与文化认知过程的全面记录。

著作以书名《考古天津》为纲，以“问津”“访山”“探河”“寻城”“踏海”五个章节为目，“问津”是“考古天津”的分解起点和导引，后四章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对天津地理空间层级的直接反映，以“燕山走向渤海”为空间路径，北部为燕山山地——访山；中部是京杭大运河贯穿的冲积平原——探河；核心为三岔河口的城市聚落——寻城；东部面向渤海湾——踏海。这本著作全面回答了天津辖域内十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千年城市形成发展史的基本问题，用考古人的真实足迹，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和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回应并深化了天津历史与文化研究。

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按照考古遗存所处的不同自然与人文空间单元（山、河、城、海）进行归类研究的方法，凸显了各个空间单元的核心历史功能与遗产特质，有利于将天津考古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不同空间单元的遗产保护实践与公共阐释。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深耕天津考古一线，2016年以来先后出版《考古杂俎》《说说考古》《考古何为》三部学术著作，从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深入思考到理论与实践持续思考的落脚点，《考古天津》应当为阐释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一种“考古学方案”。

第一章“问津”，总领全书，《天津市考古五十年》一文概述自1953年中科院考古所调查宁河先秦遗址开始，五十年来天津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考古遗存。《考古的天津》一文，根据天津北枕燕山、东临渤海的地形特点，由北而南划分为山地、山前洪积平原、河湖冲积平原、滨海平原、海岸带等若干地理单元。分布在不同地理单元的古代遗存显示出这种分布规律：越靠近北部山地的遗存年代越古老，越靠近南部海洋的遗存年代越年轻。当下对滨海新区的建设仍然是古代先民从燕山到渤海不断拓展生活空间的历史延续。

第二章“访山”收录多篇序文，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他序。如《天津万年以上人类活动考古学实证》记录作者从90年代初萌发“上山下海”的想法到2005年蓟县旧石器调查计划启动，很快发现27处旧石器地点的全部过程，填补了天津旧石器考古的空白，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津第一部佛教考古报告》回顾了蓟州多宝佛塔的考古工作过程，其独特的装帧形式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例。通过在考古情境中获取以物叙事的考古遗存及现象，揭示出元明清多元一体背景下，佛教与道教从争斗到共生的历史事实，生动反映出中国北方地区明清时期多元文化融合共生，出土文物实证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第三章“探河”聚焦天津大运河遗产保护，主要论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清十四仓遗址的主要收获及天津南北运河沿岸的明清时期乡土墓葬的重要意义。作为首次发掘的元代国家漕运仓储遗址，十四仓遗址为研究元代漕仓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是体现中国大运河突出普遍价值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乡土墓葬的研究为探讨明清时期天津地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与研究视角。而从大运河沿岸家族墓地的视角研究，将考古学分析引向了社会史研究，拓展了学术研究空间；同时建立起的明清人骨标本库，已收集天津地区出土的古代人骨标本上千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第四章“寻城”重点讲述天妃宫遗址及天津卫故城遗址等天津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回忆天妃宫遗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和《城兮归来——天津卫故城遗址考古的重要意义》两篇纪事文章，真实记录了现代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马家店遗址发现与保护的艰难历程》一文站在殷墟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的时代节点上，回望1899年王襄、孟广慧在天津“西门外马家店”发现辨识甲骨文，成为中国甲骨学史上举足珍贵的起始坐标，而经历了30多年艰难保护的马家店遗址，历史上最终还是夷为平地。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建筑王家大院，当时以其独特的布局形态和结构，成为中国农业文明社会差序格局的历史见证，也已荡然无存。作者不禁感叹，历史建筑消失的同时，树木却都被保留下来了，历史文化何时能像自然环境一样受到重视和保护？

第五章“踏海及其他”，涉及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就广泛关注的西汉末年渤海湾西岸曾发生过一次大海侵的问题。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最终可以得出结论：渤海湾西岸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由战国至西汉，再到东汉魏晋一直延续到隋唐以后，其间从未发生过中断；渤海湾西岸西汉末年的海侵未得到考古学方面的证实。而天津明清海防遗产体系，经过二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已经初步构建起由军事指挥中枢（天津卫故城遗址、梁城千户所遗址）、层级防御系统（大沽炮台遗址、北塘炮台遗址）、近代技术支撑体系（大沽船坞旧址、天津机器局旧址）以及精神信仰中心（大沽海神庙遗址）等共同组成的一整套认知体系。其复合性、真实性与完整性，充分体现了“系列遗产”和“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突出普遍价值，为深入理解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彰显城市个性，以及开展系统性保护与价值阐释，奠定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

作者提出天津文化的三元结构是非常独特的创建。他认为，天津文化由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与津派文化三个基本单元构成，即考古学揭示的“物质与历史结构”奠定天津文化基础，人类学阐释的“社会与意义系统”建构天津文化框架，二者互构生成文化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最终通过天津人群体实践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天津文化三元结构体现了时间性、空间性与实践性互构的文化延续规律。此规律也应该适用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研究。

《考古天津》一书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天津为核心，通过对以长城、大运河、明清海防三大线性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天津考古遗存的系统性价值阐释，论述了天津城与天津文化的关系。走过了73年的天津考古，从燕山到渤海田野考古工作，构建了十万年以来的完整编年序列，以多学科研究方法结合，加强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将天津历史与文化的叙事置于中华文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宏大体系中，使天津历史与文化研究建立在确凿的实物证据和清晰的历史脉络之上，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作者单位：天津博物院）

《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
作者：陈雍
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3月

本版责编：冯朝晖 丁淑娇 张 宸

阐释天津历史文化的考古学方案

赵娜

——《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书评